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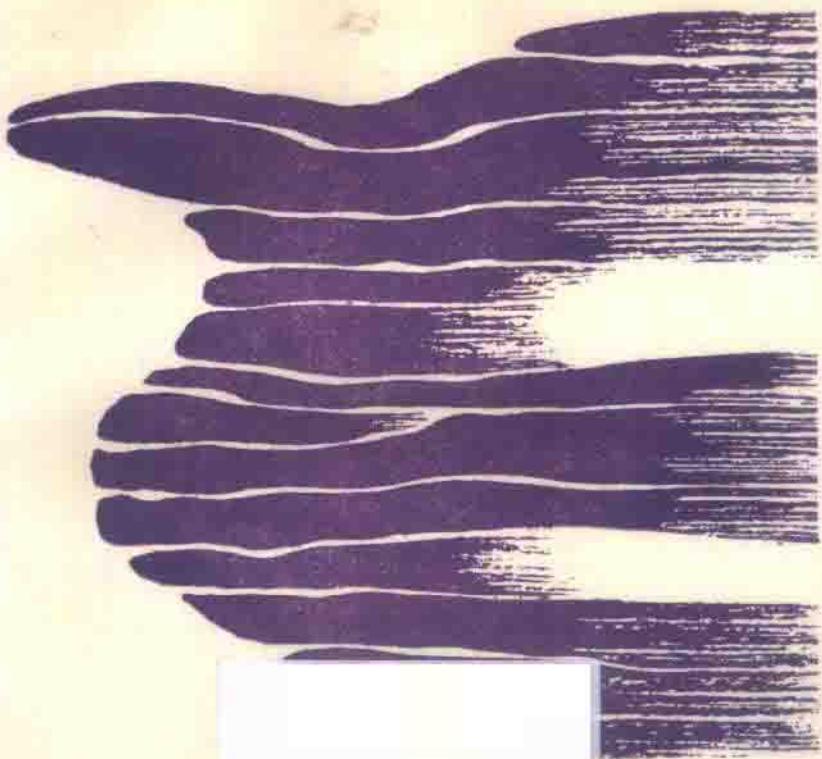
# 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

CHONGQING  
CHUBANSHE  
CHONGQING



● 秦亢宗  
● 菲成璠

● 重庆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 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



亢宗 蒋成瑀

重庆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乔 楠

**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                   秦光宗 蒋成瑞

---

重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305千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6,700

---

书号：10114·216                   定价：1.77元

## 序

秦亢宗、蒋成瑀两位同志，合作编撰了一本《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要我写篇序文。对于这项工作，平时我也有些想法和看法，现在就乘便在这里谈谈，作为本书的小引。

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无论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或是文学史的编写，都已有了不少成果，这是很可喜的；但专门研究新文学思潮和流派发展方面的著作，目前还没有，是个空白。“五四”以来，新文学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出现了三面伟大的旗帜：鲁迅、郭沫若、茅盾，同时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杰出的作家。我们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是有一定的收获和成绩的，现代文学史也已出了好几部。但是，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思潮和流派的角度来研究作家作品，这样的东西还很少有人去搞，虽曾有人写过单篇文章，但成本的著作还没有。现在，这一课题引起了秦、蒋二同志充分的重视，并且勇敢地挑起了担子，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

但是，要搞好这项工作，难度也很大。首先是怎样研究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规律问题。我认为，如果编一本“西方文学思潮史”，这比较好办，因为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变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比方

说，文艺复兴之后，十七、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时代，从大方向看，它是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的。经过大约两个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出现了，它是反封建主义的表征，在文学上是以反古典主义的姿态出现的。再下去有一个反浪漫主义的趋势，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兴起。到十九世纪末叶，所谓“世纪末”的文艺思潮，如象征派、颓废派、唯美派等等，又一度显现出反现实主义的面貌，在文学史上称为“新浪漫主义”。再下去，到二十世纪初，这股流风遗韵没有中断，于是五花八门的玩意儿，什么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一大串都出来了，这是由新浪漫主义趋向于极端而产生的，是一个不算很小的逆流。最后拨乱反正，便归结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据此看来，我们讲西方文学，脉络是很清楚的。当然各国又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都是向现实主义发展的。近代文学以法国为中心，从法国文学来看，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等浪漫主义作家，最后都发展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至于那一股逆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小资产阶级作家怀疑自己的命运，从而在文学上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瞻前顾后，动摇彷徨，也想前进，却又逃避；即以象征主义为例，象征既不同于想象，又不同于联想，漫无线索，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结果必然与神秘主义结合，趋向到反现实主义方面去了。这就是西方文学发展的概况，所以我说它是有规律可寻的。

我国不同于欧洲。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生活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广大人民有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要求，所以“五四”新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其时外来的東西蜂拥而入，乍看起来，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颇有些相似之处。但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从明治时代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发展到以白桦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大正时代又出现了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最

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崛起了所谓“新兴文学”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轨迹分明，层次井然，整理起来并不困难。我国现代文学在“五四”开始的十几年之间，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各种流派纷至沓来，一方面说明新文学发展之繁荣和迅速，另方面说明各种流派的消长，要寻找其中的规律和主流就得费较大的劲，有待深入钻研、讨论。

另外，我国现代文学流派中的许多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各种流派之间的关系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例如“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当时的一大流派是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鲁迅虽然没有参加，但他是支持该会的现实主义的。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打起浪漫主义旗号，是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是另一大流派。二者差不多同时出现于文坛，虽然各自为战，不免互有分歧，但目标相同，方向一致，很早就殊途同归，滚滚向前，形成主流。在向前发展的途中，有许多支流汇合拢来，一齐奔向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这就是左翼文化运动。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直到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无庸讳言，后来出现的许多流派，或旁附主流，成为支流，或与主流相对立，成为逆流，情况颇为复杂。但即使 是支流或逆流，由于它们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作为经验教训，我认为也很值得研究。至于有些作家的发展变化也比较复杂，例如闻一多开始是新月派中有成就的诗人，后来他自己在创作实践、社会实践与斗争实践中，不断前进而走向了民主道路。徐志摩刚回国时，也有雄心壮志，要参加中国社会的改造，但他一步步与保守的、反动的人物如胡适、陈西滢等合流，最后甚至站在对立面，写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人说徐志摩是浪漫派，我说有点象；有人说他是唯美派，我说也有点象；我认为他是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他有才气，有诗人气质，但因目光不够宏远，境界不够广阔，终于未能成为大诗人。

因此，我认为研究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思潮，更不能脱离作家及其作品，应该把历史时代与作家和作品联系起来考察。一种文学流派是怎么形成的，它们怎样继承了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了哪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当时在群众中起过什么作用，为什么在历史发展中有深远意义，等等，这些都与作家和作品息息相关。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来谈思潮流派，就不免于空泛。对待作家应采取历史的发展观点，例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有功绩的，后来由于主观原因，他终于堕落，令人扼腕。也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如闻一多、戴望舒等。对这些人，只有从历史观点出发，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要抢救资料，不管真的假的都拿来，拿来之后再审慎地加以鉴别。近来看到一些回忆录，有些象写小说一样近乎虚构，有些似乎在进行自我宣传，有些是带着很深的成见写的，象茅盾那样写得真实恳切、可以作为信史读的，还不大多见。是真是假，要仔细分析，多方参证，认真核对。对于许多旧资料，得来非易，弥足可珍；但由于过去社会形势复杂，文坛情况混乱，为辨明是非真伪，更要追本穷源，避免轻率作出论断。对于翻译、介绍某些外国作家作品，也要认清翻译者或介绍者的观点和意图，是鼓吹、介绍还是批判，必须分别对待。比如宋春舫，他译了九个未来派戏剧，但他并不就是未来派，只不过为了介绍意大利现代文学而已。又如郑振铎等译介拜伦，是出乎喜爱和推重，但他们并不是浪漫派。三十年代我在北京几所学校讲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约我写点介绍文章，我写了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等六篇论文给他；我是左翼作家，当然不属于这些流派，在介绍中我是批判这些东西的。

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最好由一些参加过历次文艺运动的人来一起商讨。但这些老人活着的不多了，连象我这样的三十年代的“毛头小伙子”也越来越少了。主要还要依靠中青年同

志来搞。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赴海南岛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会上曾讨论到我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秦亢宗同志也带着研究张资平和海派小说的论文前往参加。在此之前，他曾在杭大中文系讲过“现代诗歌和小说流派”的专题课；蒋成瑀同志也曾在浙江教育学院讲过有关现代文学中的流派问题。现在他们合作编撰《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这本书，探讨“五四”以来的诗歌和小说的流派问题，各篇皆以研究代表作家为主，旁及其它作家，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在编撰中他们搜集资料颇详，涉及到一些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提到的作家，如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象征派），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现代派），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海派小说）等等。因为某一流派的形成，往往以某一作家为首脑，又有其他一群作家继起应和。作者采用“突出重点以及其余”的方法，便于使读者窥见某一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全貌。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社团和流派繁多，本书所述，仅仅反映出一个概括的面貌，显然是不够全面、不够详尽的；书中评价人物，评衡作品，也不免见仁见智，各抒己意。但这是一项新的课题，草创伊始，难期完善；要求精益求精，尚有待专业作者们的继续探索和深入钻研，而秦、蒋两同志甘愿做拓荒者，不辞辛勤去从事耕耘，这种精神总是值得鼓励的，故乐于为之序。

孙席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杭州

## 目 录

|                     |        |
|---------------------|--------|
| 序 .....             | 孙席珍    |
| “五四”时期的写实派白话诗 ..... | ( 1 )  |
| 郭沫若和浪漫派新诗 .....     | ( 36 ) |
| 闻一多和新月派现代格律诗 .....  | ( 73 ) |
| 徐志摩和新月派诗歌 .....     | ( 99 ) |
| 李金发和象征派诗歌 .....     | (138)  |
| 戴望舒和现代派诗歌 .....     | (199)  |
| 冰心和人生派的“问题小说” ..... | (219)  |
| 郁达夫和感伤派小说 .....     | (250)  |
| 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 .....   | (279)  |
| 张资平和现代海派小说 .....    | (317)  |
| 沈从文和现代乡土文学 .....    | (334)  |
| 赵树理和“山药蛋派” .....    | (362)  |
| 后记 .....            | (382)  |

## “五四”时期的写实派白话诗

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于“五四”前夕。当时的一班先进人物，高擎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旗帜，声势赫赫，破旧立新，冲击着封建旧文学的樊笼。白话诗是新文学运动最早的婴儿，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短短的几年时间，许多报刊都有它的阵地，形成了绚丽灿烂的局面，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和不同类型的诗体，花团锦簇，各呈异彩。这是“五四”思想大解放带来文学创作勃发、繁荣的普遍现象，不独白话诗为然。那末，白话诗的这种灿烂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白话诗萌发的历史轨迹。

### 白话诗的崛起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末，除去小说，都已成为强弩之末，内容陈腐，脱不开经史子集，尤其是诗歌，拾古人之唾余，颠来倒去几句老婆子舌头语。胡适曾引他的朋友、后来的复古派胡先骕的一首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

绕柱。

这是最典型的无病呻吟，陈词滥调。胡适说：“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sup>①</sup> 旧诗词不仅装腔作势，言之无物，而且束缚思想，误人青春。所以文学革命和诗体解放，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早在十九世纪末，适应变法维新的需要，文学上已经出现了改革的呼声。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梁启超则推行“新文体”，向封建正统文学挑战。鉴于文言有碍于传播西方新学，所以他们又主张废文言而行白话。《无锡白话报》的主要创办人裘廷梁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sup>②</sup> 但是他们的改革失败了。因为一方面由于新的革命运动尚未形成，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改良的命运只能半途夭折。

无数量变的积累，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引起新的质变。“五四”前夕，随着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一场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运动正在我国兴起。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只是“改良”和“刍议”而已。同年三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气魄极大，而且“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更“不容他人之匡正”。接着刘半农又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引起人们的关注。伟大的十月革命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②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和“五四”运动，使这场革命走上了正道，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文学的统治地位，初步建立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这在语言形式上也是一场大革命，使几千年来 的文言的正宗地位，被较接近于人民群众的语言——白话所代替，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也为后来的文学大众化开辟了道路。在这场革命中，诗体的解放首当其冲，白话诗成了开路先锋。

为什么白话诗会成为开路先锋？按照封建正统的 文学观念，只有诗和散文可以登大雅之堂，戏曲和小说是不在其内的。一般人都承认后者可以采撷白话俚语，前者万万不可，尤其是诗，唯有用文言写，才能传出神韵。这几乎成为文学革命的头一道壁垒。为了打破它，白话诗就应运而生。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首次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次年一月《新青年》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白话诗九首。这些诗，是我国新诗草创时期最初的一批产儿。以后又有陈独秀、唐俟(鲁迅)、俞平伯等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随着新诗作者队伍的不断扩大，诗集也陆续出版，“五四”后的三年中出版的诗集，计有胡适《尝试集》(1920)、郭沫若《女神》(1921)、俞平伯《冬夜》(1922)、康白情《草儿在前集》(1922)、应修人等四人合集《湖畔》(1922)、汪静之《蕙的风》(1922)、徐玉诺《将来的花园》(1922)等。一九二二年一月，由俞平伯、朱自清、刘延陵等主编的《诗》月刊出版，它的诞生，是新诗蓬勃发展的标志。

新诗运动，首先是从诗体形式的彻底解放开始的，它的崛起，使诗歌“从旧的镣铐里解放出来”(朱自清语)。要运用现代白话进行创作，就必须冲破旧体诗词的格律形式等束缚，以适应表达新思想、新精神的要求。胡适在《谈新诗》中说：“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

近年的新诗运动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够跑到诗里去。”不拘格律，形式自由的白话诗，在内容的表达上，是旧体诗所不及的。“诗体大解放”，确实在新诗的建立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解放诗体，决不仅仅作形式上的改良，也是内容上的一场革命。随着形式的充分解放，白话诗的内容便开始面向现实，表现时代所赋予诗人们的新精神，由此开始迈上了坚实的现实主义道路。正如茅盾所指出：“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最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sup>①</sup>

“五四”初期白话诗为什么一开始就沿着现实主义（当时称为写实主义）的方向呢？这与当时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倡写实主义的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最早提倡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他在一九一五年《新青年》第四号答张永言的信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后来，他在《文学革命论》里指出，旧文学脱离生活实际，掩盖社会矛盾，以虚假的臆想来粉饰现实：“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以及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在他的“三大主义”中还明确提出要“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的口号。刘半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发表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是第一篇从理论上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论著。在这篇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辛亥革命以来的诗坛，说它已成为“假诗世界”；同时，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的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

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所着重批判的是旧文学中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在创作方法上提倡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

---

①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

义原则。“五四”时期白话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从根本上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有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图景，也有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有对未来新生活的渴望，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索；有对工农大众热情的歌颂，也有对自由恋爱的大胆追求。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消极颓废的哀歌，也没有无病呻吟的悲叹。向往自由，追求光明，诅咒黑暗，同情人民，直面人生，积极乐观，是白话诗的基本倾向；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想，是白话诗的基本内容；采用“具体的做法”抒情说理，运用接近人民大众的口语，句式活泼多样，音韵自由，是白话诗的基本表现形式。白话诗的作者们虽然没有组织过诗歌团体，发表过共同的宣言，而且政治观点和艺术水平的差距也很大，但上述三个共同的特点，使他们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诗歌流派，人们称之为“五四”写实派白话诗。

写实派白话诗是“五四”时期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影响都很大。文学研究会的诗人差不多都属于这个流派。此外，还罗网了其他一些文学团体的诗人，除了创造社的浪漫派，差不多的诗人都包括在内了。说得夸大一点，这个流派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新诗创作上的反映。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理论和诗歌，无形中起着引路的作用。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针对胡适提出的用白话写的文学都是新文学的观点，明确地指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提出新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为“土壤、根基”，给新诗的创作指明了方向。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反映人间的不平。作者在描述贫富对立的画面后，发出“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的感叹，表现了革命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李大钊写过不少诗，现存二十五首诗中有六首是新诗。这些诗清新自然，内涵丰富，如《山中即景》：“……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

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融情入景，格调明快、流畅，借赞美自然，寄寓着乐观主义的精神。相类似的诗还有《山中落雨》、《山峰》等。《岭上的羊》是一首抒情诗，以羊为喻，抒发作者对千千万万被欺压、被侮辱者的同情，激发人们起来斗争。李大钊的诗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造诣，都是当时白话诗中的佼佼者。

“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周恩来同志的诗。他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写过十四首诗，其中一部分是白话诗。《雨中岚山》、《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和《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诸篇，写日本的自然风光，借景抒怀，鞭挞“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探索革命的真理；讴歌十月革命，“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别李愚如并示述弟》是作者身陷囹圄，在狱中写的。诗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赞扬李愚如追求真理，勉励她到法国勤工俭学，磨炼才干，“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这首白话诗，有景有情，有叙述有对话，如对人促膝谈心，读来倍感亲切。全诗八十多行，据作者说仅两小时半就“居然成功了”，这是感情喷薄的结晶，不是勉强作出来的。《死人的享福》歌颂车夫的高贵品质，思想内容比胡适和沈尹默同一时期写的《人力车夫》，更为忧愤深广，直可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媲美。《生别死离》为哀悼被军阀枪杀的无产阶级战士黄爱而作。全诗感情深沉、真挚，一字一句发人深思：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生和死？一字一句催人战斗：革命者要“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去夺取胜利。周恩来同志留下的几首白话诗，采用新鲜活泼的口语，形象鲜明，思想深邃，且每一首诗都不雷同，无疑是白话诗的珍品。

### 胡适的《尝试集》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在于他有否提

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看他比前辈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对胡适尝试白话诗的行动及其诗集的评价，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胡适从一九一六年七月开始作白话诗的试验，一九二〇年三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是现代新诗创作最早的产儿。《尝试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了四版，发行万部。以后还不断再版，影响颇大，以至当时写的白话诗，曾一度名之曰“适之体”。章士钊说，当时一般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sup>①</sup>这话自然是一种有意的夸张，但《尝试集》确是当时一般青年诗歌作者手中常备的读物。

胡适为什么要尝试写白话诗？据他自己说，是为了要实现“诗体的大解放”，“开辟文学殖民地”。《文学改良刍议》的中心思想便是要使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学的正宗，认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是最难攻破的堡垒。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企图以白话诗打通文学革命的道路。他把诗国要革命的主张向留美的同学发布出来，但遭到一些保守派的反对，这反而促使他下决心去攻克旧诗的堡垒。一九一六年，他在誓诗中写道：“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他回忆道：

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下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试造白话诗。<sup>②</sup>  
当时文坛上拟古诗风行一时，胡适敢于作先锋，这种精神是相当可贵的。“‘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

<sup>①</sup>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sup>②</sup> 胡适：《遇上梁山》。

古成功在尝试'。”在尝试过程中，有人讪他的诗如“莲花落”，有人骂他沽名钓誉，也有人劝他，以君之才，为何不走正道，要旁逸斜出？胡适一一顶住了。刘半农回忆说：“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胡适之诗中‘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更有甚者，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sup>①</sup>胡适敢于披荆斩棘地大胆“入地狱”迎击旧势力的挑战，开辟新诗的路，并在诗坛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流派，是有其历史贡献的。

胡适的《尝试集》内容比较杂，但基本倾向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五四”的时代精神相一致。诗集中有的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黄克强先生哀辞》），有的表现个性解放的思想（《鸽子》），有的歌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沁园春》），有的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礼》），有的表现封建专制的罪恶以及奴隶们的反抗（《威权》），有的歌颂劳工神圣（《平民学校校歌》），这些都是富有社会意义的诗篇。另外，诗集中也有少量反映封建伦理观念和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的庸俗无聊之作，是其糟粕。

诗集从形式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话诗，一类是洗刷的旧体诗词，一类是旧体诗词。其中以第一类诗最为当时人所瞩目。该书在修订时，曾征求过鲁迅等人的意见，在再版时又筛掉了不少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均无可取的东西。诗集中有不少白话诗，一洗旧诗词的痕迹，把旧体的长处融合于自由体中，并且从外国诗中吸取养分。如《乐观》、《鸽子》、《一颗遭劫的星》等篇，语言比较清新明艳，节奏比较自然，接近口语，“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另外，他还比较注意诗句的音乐美，能在旧诗词音节的基础上，加以改制，创造新的自然音节，如《老鸦》中的“我不

---

<sup>①</sup>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